

【统战问题】

西安事变中的宋美龄

陈莉莉, 梁星亮

(西北大学 应用社会科学系,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宋美龄发挥了独特而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稳定南京政局、沟通宁陕对话、亲赴西安救蒋的举动,有力地促进了事变的和平解决。而她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在于她做到了情感与理智的有机结合,身份与素质的相得益彰以及主观与客观的因势利导。

关键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宋美龄;原因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5)01-0077-05

Song Meiling in Xi'an Incident

CHEN Li li LIANG Xin liang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Xi'an Incident is the result of many factors, among them Song Meiling has played an unique and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incident. The reason that she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lies in that she has accomplished organic integration of emotion and rational making the best use of her identity and quality and bringing out the best of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Key words: Xi'an Incident; peaceful resolution; Song Meiling; reason

宋美龄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很有影响力的知名人士,她的一生跨越了19、20、21三个世纪,度过了106个春秋,见证了中国最为激荡的百年历史,参与了数次重大的历史事件,而她在西安事变中的所作所为正是其人生的亮点之一。史学界对西安事变的研究已达到较高层次,对参与事变的重要历史人物也多有论述,但对其中宋美龄的研究则相对少见。有鉴于此,本文拟对事变中宋美龄的作用及其发挥作用的原因作一概述。

一、力排众议,稳定南京政局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的当晚,南京方面即召开中央常委会临时会议及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指挥调动军队归何应钦负责,会议还规定:张学良应先就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

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1]对张学良所部的直接指挥当然只是南京方面的一厢情愿,但指挥调动军队之权却赋予了何应钦非常时期的至高权力。是日夜,黄埔系的核心组织之一复兴社召开干部会议决定“营救领袖,安定后方”。^[1]第二天,捉蒋消息传到南京,南京秩序顿时混乱,各主要街口增加警察哨岗,同时,南京政府授权军委会发布戒严令“于必要地区宣布戒严”,并派数架飞机飞西安上空侦察。南京《中央日报》以《昨日西安之叛变》为题发表社评,称西安事变是“犯上作乱”^[1],并叫嚷“若不严申国法,立予声讨,将无以对人民付托之重。若不急起剿除,又何以对国家倚重之殷”,^[1]为“讨伐”张、杨摇旗呐喊。14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国民政府总理纪念周上说:“张学良所标榜的口号,有所谓容共抗日,实在幼稚可笑。因为抗敌目标在求生

收稿日期:2004-10-14

作者简介:陈莉莉(1981-),女,河南荥阳人,西北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存,而容共的结果必致灭亡,所以抗敌和容共合在一起,根本是有害无利,达不到救亡图存的目的……”^[2]连日来,南京电台干扰西安电台广播,与此同时,南京不断造出许多离奇谣言“张、杨把省会公安局长钉在城门上”;“红军占领西安洗劫全城”;“张学良被部下刺杀”;“红军诱骗男女青年‘共妻’”;“整个东北军西北军变成土匪到处抢劫”;“张学良要求8000万赎回蒋介石”等等。16日上午9时,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第30次会议,决定推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随即南京军队二十八、三十六、五十七等师进潼关,逼二华,并派十余架飞机飞渭南、三原投弹,炸伤居民多人。南京方面几日内形势急转直下,讨伐之声甚嚣尘上,局面一发而不可收。从对以上史实的分析中我们可知讨伐派主要来自三股势力。首先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是讨伐派的中坚。其次,部分国民党元老派也给讨伐派以强有力的支持,戴季陶就表示“这件事非采取主动,非用兵不可”。^[3]第三,黄埔系也是讨伐派的重要力量。虽然三者的动机和目的不尽相同,但在行动上却达到了相当程度的一致,而这种一致是非常可怕的。

西安事变发生时宋美龄正在上海的寓所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宜。从孔祥熙那里得知“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身份不明”,后“不啻晴天霹雳,震惊莫明。”当夜即由沪返宁,晨7时抵南京时,南京政府“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的命令已经发表。宋美龄强调:“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瞭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余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在以后的几天中,针对主战派的不同势力,宋美龄分别进行了如下活动:首先,针对主战派的中坚何应钦,宋美龄一针见血的指出:“今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之生命”,“委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连系”。在与何应钦争论和战问题时,宋美龄也明确指出:“余虽为妇人,然余发言绝非为营救丈夫之私意,倘委员长之死,果足为国家造福,余则必首先劝其牺牲。”^[4]宋美龄的强硬态度,使何应钦也不能不有所顾虑。其次,对于国民党部分元老派支持何应钦讨伐的行动,宋美龄反复强调采取军事行动后果的严重性,“唯目前处置西安叛变,若遽张挾伐之师,径施轰炸,不独使举国所拥戴(疑为戴——引者注)领袖之生命陷于危殆,即陕西数千万无辜良民,亦重罹兵燹之灾,且将

使为国防而建设之国力,浪作牺牲。”^[4]她同时大声呼吁:“请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劝阻大家保持冷静,寻求对事变的和平解决。原来坚主讨伐的戴季陶后来也表示,“先进行和平营救,如果和平营救无效,再进行武力讨伐。”^[4]元老派的态度有了一定的缓和。第三,作为讨伐重要力量的黄埔系,宋美龄要求:“于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遽加断定,遇事镇定,勿尚感情。”黄埔系是蒋介石栽培的嫡系,效忠蒋介石是他们的行为准则,也是他们坚决主张讨伐的根本动机。宋美龄告诫他们:“委员长抚爱诸生如子弟。目前遇此事变,正为诸生敬谨遵行师训之时。”他们中的一部分最终接受了宋美龄的主和劝说,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宋美龄利用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通过以上诸方面的努力,最终在一定程度上稳住了南京政局,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南京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二、打破僵局,沟通宁陕对话

前已述及,事变发生后,由于南京方面对消息的干扰和封锁,通讯交通的阻断以及新闻报道的捕风捉影,真相不明,谣言四起。宋美龄首先要孔祥熙电张学良“尚希指定电台一处,以便随时通电,而免延误”。^[1]而宋美龄在西安事变中“最卓有成效,最富有勇敢精神和感情智慧的举措是选派端纳亲赴西安,使互相封闭、孤立、对立、猜疑、愤怒的僵局被这一富有人情味的行动所释解。”^[5]事变第二天,宋美龄即电张学良“端纳即日飞陕”,端纳同时电张“盼其即复”。张学良当即复电宋美龄及端纳,同意端纳来陕。至此,端纳受命于危难之时,前往西安进行斡旋和居中调解。他带去了宋美龄分别写给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信。在给张的信中,她说:“吾兄肝胆照人,素所深佩,与介兄历共艰危,谊同手足。……昨日之事,吾兄及所部将领,或激于一时之情感,别具苦衷,不妨与介兄开诚协商,彼此相爱既深,当可无话不说。否则别生枝节,引起中外疑惧,不免为仇者所快,亲者所痛……”^[6]在给蒋的信中,宋美龄耐心且认真地指出,你的脾气不好,你心中的话总不肯很好地对部下说明,你也不能虚心地倾听部下的意见,这种情况,我很耽心。……东北军官兵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要求抗日是很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对他们的抗日情绪,应该很好的安慰。……我托端纳先生冒险去看你,望你为国家

为民族保重身体。可能和必要的时候, 我愿亲去西安。并在信结尾特地指出“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7], 暗指何应钦借机轰炸西安可能是另有所图。这充满温情的两封信, 给事变的当事人张、蒋都带来了希望, 更重要的是, 它让蒋介石进一步了解了事态的发展。端纳到西安后, 了解了事变的真相, 发出新闻稿两则, 阐述了张、杨此次事变的动机, 并指出: “南京方面将此次消息封锁, 且有人造谣, 致国人不明真相。”^[1] 15日下午 5 时, 端纳自西安乘机东返, 晚抵洛阳。端纳以长途电话向宋美龄汇报到陕情况, 谓蒋在西安“并未受苛刻待遇”, 并向南京转达张学良“欢迎宋子文到陕”。宋美龄“惊喜欲狂”。^[1] 然而对于端纳的来电, 何应钦故意曲解, 并于 16 日明令讨伐, 大肆轰炸, 面对这种局面, 宋美龄立即请端纳再飞西安请蒋下停战手令。蒋介石一方面害怕讨伐会危及自己的生命, 另一方面又想利用军事威胁作为向张、杨讨价还价的资本, 故给何应钦下了停炸三天的手令。三天的缓冲, 为进一步和平解决事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为了利用这来之不易的缓冲时间, 加速事变的和平解决, 宋美龄决定让其兄宋子文赴陕。由于南京方面阻力横生, 二宋商定, 宋子文以私人身份赴陕。12月 20 日, 宋子文到西安后单独与蒋介石晤谈, 并于下午和张学良进行了长谈, 了解到中共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宋子文赴陕, 使宁陕有了进一步的沟通, 为下一步的和谈作了有利的铺垫。

三、情真意切, 亲赴西安救蒋

有了之前端纳和宋子文的沟通和协调, 宋美龄进一步了解到西安方面决无伤害蒋介石的意图以及中共力主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 感到和平解决事变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何应钦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完全停止, 20 日拂晓, 华县前线发生激战, 上午 8 时, 南京中央军董剑部攻占华县。东北军纷纷东开, 抵御“讨逆军”进攻, 形势仍有逆转的可能。而且她了解蒋介石脾气暴躁, 容不得张、杨的这次行动, 拒绝谈判, 这使得和平解决又面临很大的困难。

此时,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不仅是一切有识之士的正义呼声, 也是大敌当前之下保证民族利益不失的唯一途径。然而, 虽然有了西安方面的表态和中共方面的关键性努力, 还需要有一个能在蒋介石和西安、南京之间斡旋, 并赋有权威性的人物, 帮助化解对峙的局面。这个人物, 恐怕没有比宋美龄更理想的了。“作为妻子, 她是最能打动蒋介石态度的

人; 作为委员长夫人, 她的权力人格足以取信于西安方面; 至于南京方面, 谁也无法阻拦宋美龄以家属身份去西安, 反过来, 只要蒋介石不死, 谁也不敢否认她潜在的权威。”^[8]

当时的形势仍很紧张, 内战随时有可能爆发, 赴陕的风险很大。张学良来电表示, 若不能阻止进攻切勿往陕, 因无力保护其安全。^[1] 何应钦也恐吓说西安已是“赤色恐怖世界”。南京也有人提醒宋美龄“倘赴西安不独不能晤委员长, 且将被囚作质, 丧尽尊严。”但宋美龄认为, 若使危局得以根本好转, 非亲自面晤张蒋不可, 遂于 22 日冒险飞抵西安。

宋美龄到西安后, 夫妻见面的情形, 宋美龄在事变后作了这样的描述: 余入吾夫室时, 彼惊呼曰: “吾妻真来耶? 君入虎穴矣!” 言既愀然摇首, 泪潸潸下, 余强抑感情持常态言曰: “我来视君耳。”蒋屡言要以身殉国, 不肯与张、杨谈判, 宋美龄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 “此后君不应轻言殉国矣, 君之责任, 乃完成革命以救国, 君更应宝贵君之生命”, “倘处理得宜, 或可立即解决, 我等目前应自制, 应忍耐。”在至亲之人情理并茂的劝导下, 蒋介石的态度有所松动, 开始考虑张、杨的主张。

在和蒋介石会面后, 宋美龄又面晤张学良。因二人私交甚好, 宋美龄直接明确地指出: “彼等自谓此举得全国民众之拥护, 实属错觉”, 对此张学良也深有同感, 本以为发动事变是人心所向, 但因事变之初南京作了手脚, 一时舆论哗然, 倒使他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 加之蒋宁死勿谈的态度确使他骑虎难下, 进退维谷。宋美龄的到来无疑给了他走出困境的希望。张学良对她说: “如果你在西安, 就不会发展到现在这样局面。”这应该是他内心的真实表露, 他还明确表示, 他个人亟愿恢复蒋之安全, 但“惟此事关系者甚众, 不得不征求彼等之意见。”宋美龄也当即表态“凡委员长所不愿见者, 余皆愿代见之。”

经张学良的引荐, 宋美龄与“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而为委员长所不愿见者”周恩来进行了两次长谈。周恩来说明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表示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战, 中共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宋美龄表示愿共同努力劝蒋回心转意, 并请周作杨虎城早日释蒋的工作, 还明确表示, 赞成张、杨和中共关于停止内战的条件, 指出“我等皆为黄帝裔胄, 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1] 从而进一步打破了僵局。

以上的联系和沟通为正式谈判铺平了道路, 打破了十天来的僵局。蒋介石要求宋氏兄妹作为他的

代表参加谈判,商定条件他以“领袖人格”担保实现,不作书面签字。12月23日,宋美龄先请宋子文代表蒋介石同西安方面及中共代表开始正式谈判。周恩来代表张杨和中共“三位一体”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宋子文个人表示同意,答应向蒋介石转达。24日上午,宋美龄参加了继续谈判,双方对日前周恩来提出的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进行了讨论,达成了一致意见。蒋介石最终表示接受此六项主张,和平解决大局初定。

谈判结束后,宋美龄努力的中心就转到早日释蒋回南京一事上。二宋找张学良乞求于圣诞节放蒋回去,“取个吉利”。25日晨,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写信给宋子文,提出:已达成的协议必须有人签字,中央军必须撤出潼关,然后才能放蒋。否则张、杨同意,我们也誓死反对。宋子文慌忙把这一情况告诉宋美龄、蒋介石。宋美龄进一步作张学良的工作,软硬兼施,恩威并行,而此时的张学良本没有长期扣蒋的打算,又恐再生变故,当天下午便同意放蒋并亲自伴送。

宋美龄在西安曾信誓旦旦对张学良做出承诺,保证张在南京的安全且几日内即可返陕。她还对张学良的老朋友阎宝航发誓:“我们牺牲一切也要做到。”^[9]然而蒋介石却食言而肥,组织高等军事法庭对张进行军法会审,判处张有期徒刑十年,剥夺公民权五年,后虽下令“特赦”,但却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这自是后话,宋美龄虽未履行诺言,但也尽全力保护了张的安全,一句“我们对不起张汉卿”^[10]其中定也包含了不少无奈和愧疚。

四、宋美龄在西安事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分析

不可否认,宋美龄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本文的前三部分也作了分析和介绍,那么,她在事变中所作所为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呢?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探讨。

(一)情感和理智的有机结合

就情感而言,作为蒋介石的妻子,没有人比她更关心蒋的安全,蒋介石的生死直接关系到家庭的完整或破裂。退一步讲,蒋介石不仅给予她一个完整的家庭,还给予她第一夫人的身份地位,以及此身份地位所带来的一切,救蒋其实也在救她自己。

就理智而言,蒋介石不仅是她的丈夫,更是国家的首脑,它不仅关系到自己小家庭的利益,更关系到

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倘处置失当,即酿成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不仅为余夫一人生死之关系,实关系全民族最重大之问题。”

在稳定南京政局,沟通宁陕对话方面,宋美龄并没有把家事当国事,而是理智的分析,正确的判断,大胆的决策,初步拟定解决之方略,使事变向有利的方向发展。在亲赴西安救蒋过程中,由于她与蒋的亲密关系,由于她与张的私交甚好,她理智地运用着自己的情感,使僵持双方都有所缓和。患难夫妻的情感,温情而耐心的陈述,理智而深入的分析,使蒋一贯强硬的态度有所松动,蒋介石可以不信任任何人,但没有理由不信任自己的妻子。诚挚的情感,设身处地的着想,也深深打动了正处于进退维谷之境的张学良。有的书评论说“无疑,双方都有许多各自的道理,但若没有蒋夫人的影响,恐怕双方都不会有心去倾听另一方的见解。”^[11]宋美龄无疑是双方在感情上都能接受的人物。

(二)身份与素质的相得益彰

宋美龄能在西安事变中发挥重要作用,当然与她的特殊身份分不开。她有其他人无可比拟的身份优势,她是民国“第一夫人”,又是蒋的得力政治助手,还是全国航空建设会秘书长;她与端纳关系密切且与张学良私交甚厚。正如有文章评论说:“这一切使她自然成为事变解决的‘交通’枢纽。她对亲日派有威慑力,对元老派有凝聚力,对嫡系派有号召力,对蒋介石有感染力,对张学良有说服力,对国际社会有影响力。”^[12]而这一切与她的特殊身份都有很大关系。

然而身份只是外在的表象,在具体处理问题时,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能力,这又与个人素质密切相关。首先,她具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坚定的决心。“宋美龄为营救蒋介石,到处游说,日无晷刻之闲”,^[5]力排众议,对不同方面的势力全力游说,尽力疏通。而这些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坚定的决心是办不到的。一位西方记者也这样评论:“如果蒋夫人的决心稍为差一点,则1936年的年底和1937年的初头似乎逃不了灾祸的蹂躏——蒋介石的死亡和势必招致绝大祸殃的内战的爆发。”^[13]其次,她具有较强的协调和交际能力。对于南京内部的不同势力,对于西安方面的三位一体,她都采取了恰到好处的协调和交际手段。如对何应钦针锋相对,对元老派晓之以理,对黄埔系谆谆教诲,对张学良诚挚冷静,对中共真诚合作,对西安官兵许诺安危,对蒋介石情理并茂。美国外交官约翰·佩顿·戴维斯曾说,中国的

这位第一夫人在西安表现出“具有一种要是在前一个时代就会把她推上皇位的气质”。^[14]第三, 就是她的勇敢和自信。诚然, 作为蒋介石的妻子, 宋美龄为着救丈夫的种种勇敢的努力并不值得怎样惊讶, 但是在形势如此危急的情况下亲赴西安, 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正如端纳所言: “委员长的获得自由, 多半应该感谢蒋夫人, 当她飞到西安去时, 她并不以个人的安危为虑。在人们也许要遭到失败的地方, 她却胜利了, 她的人格把一切的困难都克服了”。^[15]再就是她的自信, 自信是其勇气的内在基础。对此宋美龄曾有这样一段描述: “当时余对西安事变已具一种感想, 譬之造屋, 端纳既奠其基, 子文已树柱壁, 至上梁盖顶, 完成之工作, 实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

(三) 主观与客观的因势利导

西安事变之所以得以和平解决, 成为结束十年内战, 走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新起点, 与当时的客观形势有很大关系。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是在“苦谏”、“哭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失败后, 不得已而为之。张学良就表示他做的这次行动“实一无要求, 不要钱, 不要地盘”, “我等所欲为者, 确为造福国家之计划”, “自动动机确系纯洁”, 另一方面, 中国共产党执行了正确的方针政策, 力主西安变事的和平解决, 尤其是周恩来晓以利害, 对西安事变深入分析, 鞭辟入里, 令人折服, 为变事的和平解决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国内外各种势力, 虽然各自立场不同, 但绝大多数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 苏联和共产国际虽对西安事变颇有微词, 指责“张学良之举动实足破坏中国反日势力之团结”, 但也明确指出“吾人固切盼能早日迅速和平解决”。英美两国在事变期间不仅在舆论上支持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 赞同宋美龄等人营救蒋介石的活动, 而且还曾分别通过其驻华大使向孔祥熙表示拟进行调解, 他们希望这样做“可能有助于双方达成协议”。^[16]除日本外, 国际舆论大都力主和平解决。国内舆论绝大多数也主张停止内战, 团结抗日。各地实力派对西安事变反应不一, 但基本上倾向和平解决。傅作义、白崇禧、李济深、刘湘等均表示希望和平解决。而宋美龄不管是作为妻子出于对自己家庭利益的考虑, 还是作为国民出于避免国家爆发大规模内战的考虑, 亦或是作为亲英美派出于对本集团利益的考虑, 都力主变事的和平解决。和平解决是大势所趋, 这和宋美龄的主观愿望不谋而合。顺应客观大势, 排除不利的客观因素, 因势利导, 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这也是宋美龄能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出重要

贡献的重要原因。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件震惊中外、影响深远的大事。它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 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前提条件。诚然, 西安变事的和平解决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但这并不否认个人在事件中的历史作用。宋美龄的积极参与为变事的和平解决做出了重要贡献。她力排众议, 稳定南京政局; 打破僵局, 沟通宁陕对话; 情真意切, 亲赴西安救蒋的举动, 确实有力地推动了变事的和平解决。而情感与理智的有机结合, 身份与素质的相得益彰, 主观与客观的因势利导则是她能够在西安变事的和平解决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

参考文献:

- [1] 杨中州. 西安事变大事记 [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7
- [2] 田益民. 西安事变述评 [M]. 香港: 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0
- [3] 康泽. 西安事变后南京情况 [A]. 吴福章. 西安事变亲历记 [C].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
- [4] 黄绍竑. 西安事变片断回忆 [A]. 吴福章. 西安事变亲历记 [C].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
- [5] 王海晨, 胡玉海. 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1
- [6] 张永滨. 张学良大传 [M].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1
- [7] 申伯纯. 西安事变纪实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8] 李海生. 完颜绍元. 夫人政治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 [9] 阎宝航.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以后 [A]. 吴福章. 西安事变亲历记 [C].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
- [10] 张治中. 三访被幽禁的张学良 [A]. 吴福章. 西安事变亲历记 [C].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
- [11] [美] 埃米莉·哈恩. 宋氏家族 [M]. 李豫生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5
- [12] 王文鸾. 宋美龄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地位和作用 [J]. 史学月刊, 1996 (6): 104—108
- [13] J·M·贝特兰. 一个西方记者眼中的西安事变 [M]. 林淡秋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0
- [14] 陈廷一. 宋氏三姐妹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3
- [15] 杨树标, 杨菁. 百年宋美龄 [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2
- [16] 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编. 西安事变简史 [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

[责任编辑 杨彬智]